

批判·责任·道义：批判理论与高等教育*

张继明

摘要：批判理论通过揭露畸形社会结构背后的制度和 cultural 因素，启蒙人的觉醒意识和反抗能力，从而使之走向自由；该理论批判了教育的工具性角色，指出教育通过再制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国家权力和文化来延续社会不公；它给我们的启示是，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促成人的解放”这一基本价值取向，高等教育研究者也必须遵从人文价值原则，秉持服务大众的学术立场和社会责任观。

关键词：批判理论；社会结构；再制；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解放功能，但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弱势社会阶层子女在整个高等教育过程中都处于不公平境遇，高等教育日益扮演着一个排斥阶层递进的角色。对于高等教育解放功能的弱化，批判理论的解释颇有独到之处。那么，何为批判理论？它如何应用于高等教育的实践与研究？

一、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批判理论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由于批判理论学者所关注的领域极其宽泛，且不同学者的思想存在诸多差异或分歧，因而很难明确定义何为批判理论。乔伊斯·P·高尔（Joyce P. Gall）关于“批判理论研究”的定义（揭露不同文化中以及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权利关系的有害影响的研究^[1]），显然未触及批判理论的本质，因为批判理论主旨“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以求社会合理和个人幸福”^[2]。基于该理论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及人之解放的关切，笔者认为批判理论是揭露畸形社会结构背后的制度和文化促因、启蒙人的自觉意识与反抗能力从而使其实现自由解放的理论。在不平等的社会中，特权群体的权益一般是建立在法制与政治基础上的，作为反映特定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的文化也具有服务于特权的特性。因此，导致社会结构畸形的制度与文化因素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强势阶级的霸权主义，批判理论的目标正在于使大众认识到并努力摆脱霸权。批判理论的主

要特征有：

1. 致力于社会启蒙和人的解放。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优势团体总是竭力维持既得利益，弱势群体则由于受到束缚而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批判理论试图揭露特权操控、威权限制、文化暴力等束缚性因素，使人们认识到现实的不平等及其对自身利益的侵害，达到社会的启蒙，进而指导人们摆脱束缚。但同时，批判理论强调“束缚的复杂性”，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充满常识性假设和日常经验的意识”^[3]，它以常识的形式遮蔽着人的真正利益，束缚了人的觉醒意识和塑造社会的能力，从而服务于特权。批判理论致力于揭露常识掩盖下的意识形态，使人发现“常识”的本质。哈贝马斯（J. Habermas）就此提出“理想沟通”，主张通过真诚的沟通来摒弃扭曲环境下语言所含有的特权成分，促成人的平等。

在谈及人的解放时，批判理论严辞批判了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科技主义宰制的同义语，它关心方法而非目的，偏爱知性而无视感情，导致事实与价值剥离。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核武器的威胁都是工具理性泛滥的后果。批判理论批评工具理性为一种控制的欲望，造成了个人与社会扭曲，是人类自掘的坟墓。人只有摆脱工具理性的桎梏，才能实现真正自由。

2. 强调文化研究。初期的批判理论学者认为，高雅艺术具有公平、自由、解放的内质，称赞“诗人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后来批判理论学者

收稿日期：2011-06-29

作者简介：张继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福建厦门/361005）

*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支持项目（基金号 NECT-09-0679）的研究成果之一。

改变了这种观点，批判美学等高级文化作为特殊社会过程的产物，是维护特权和排斥弱者的工具，“莎士比亚是形成意识形态的场所之一”。^[4]关于大众文化研究，批判理论重在批判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即文化的商品化，由于“商品模式是构成资本主义文化和主体性的重要支撑”^[5]，因而被批判理论看作隐蔽的资产阶级统治方式，是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高级文化使大众陷入对它的憧憬而放弃对自由的追求，文化工业则像毒品一样使大众沉迷其中而丧失了追求公平与自由的信念，并相信社会是公正的。批判理论对青少年文化寄予厚望，认为在普遍顺从的“单向人”文化环境中，青少年文化保有反抗的积极性。马尔库塞（Marcuse.H）甚至将解放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身上，认为“少数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人担负着解放的责任”^[6]。

3. 批判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反对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引入社会学领域，认为任何“事实”都经由人的建构和人的价值涉入，而“客观化、中立化、量化、操作化”的科学标准破坏了人类世界的整体性及其意义，否定了人在建构世界过程中的价值参与。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批判理论学者认为批判理论本身的建构即研究的过程，是一个肯定人的价值和将人导向自由的过程。批判理论提倡在亲身实践中发展理论，因此尤其信任行动研究。“就行动研究的论证历程而言，它与批判理论颇为相似……行动是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7]在教育行动研究中，教师在研究自己教育教学过程的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行动研究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与批判理论“知识即解放”的观点一致。“由专家扮演客观和公正的观察者所进行的传统教育研究”则阻碍了教师“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控制”^[8]，这是批判理论所反对的。在具体研究层面上，批判理论认为研究应兼顾个人、制度、结构三个层次，尤其强调不公平的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

二、批判理论的教育观

教育批判理论可以被看成是反压迫教育的一种形式，通过揭露教育所维护的、被广为接受的、但具有压迫性的文化实践，达到教育研究的批判目的。教育批判理论关注教育不公平及其社会影响，探寻教育与社会不公平的缘由，并计划矫正不公平。

（一）教育“解放意识的破产”^[9]

理论上，教育具有解放功能。解放意识即冀望教育积极消除社会不平等的信念，解放意识的破产

意味着教育没有促成阶级平等，反而成为统治阶级维护既得利益、排斥和支配被统治者的工具。批判理论学者发现，来自劳工阶级的学生与来自中产阶级或主流团体的学生相比，接受较少的优质教育，而且在各级教育中其学业成绩普遍落后。从整个社会来看，财富、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不是渐趋消失而是看上去是“持续的和永恒的”。基于此，批判理论认为教育“解放意识”破产了。

（二）教育缘何失败

批判理论将教育的失败归因于社会结构，认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教育的阶级性，教育通过塑造学生与不同阶级阶层相符合的心智、技能，延续和强化了社会不同阶级、阶层间的差异。

1. 经济关系的再制。批判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结构从根本上造成学生各方面的差距。学校通过课程、教学和管理将经济结构的不平等再制到学生群体，使得不同阶级的学生在学业、文化及心理上产生差距。也即，不同阶层的学生被巧妙地置于不同的教学体系之中，部分学生习得了作为低层劳动者所必需的技能、职业规范及角色心理，他们相信不平等是天生的，失败是多数人的命运。这种学校里的阶层差异将延续到学生进入社会之后。

2. 国家权力的再制。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指出：“学校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10]个体经过教育驯化后进入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同层位，而驯化过程是服务于现有社会结构的。课程是教育服务于国家意志的直接手段，社会主义国家开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上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基于工业利益的“课程职业主义”都表明学校课程背后的政治取向。课程中的意识形态要素使劳工及其子女以为“现况正在为他们服务”，于是放弃了对解放的追求。“（课程）无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都使得学生可以并乐意成为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的被动的成员。”^[11]

3. 文化的再制。批判理论认为，教育在文化传递中再制了不同类层文化的差异，借此延续阶层差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通过分析符号暴力、文化资本来解释教育对文化的再制。符号暴力即学校文化对个人认知与信仰的扭曲^[12]，如渗透统治者意志的课程、肯定优势阶层文化而贬低弱势阶层文化的学校规定，都无形中扭曲了受害者对现况的判断，视违背自己利益的东西为自然。文化资本包括语言、思考与行为模式、价值意向等。不同群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不同，学校通过对不同群体

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使支配者文化合法化并得以积累，从属者文化则始终处于边缘。

4. 无知的反抗助推了不公平的再制。针对教育再制理论，有学者批评其忽视了课堂互动、学生次文化等微观视角，创造了“反抗理论”。该理论认为，再制必然会被某些次文化团体所反抗，而这些次文化含有解放的成分，只不过这种反抗本身反而会促成不平等的再制。威里斯（Willis）通过调查十二名来自劳工家庭的学生发现，他们强力地质疑和拒绝学校的课程运作，并追求自己观念中的自由世界。但由于他们反对知性，“工厂层面”的思维强化了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这表明缺乏知识的反抗反而促成了不公平的再制。

（三）拯救教育

批判理论体系的重心是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对自由世界的建构则显著乏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批判理论将理论本身的建构本身视为通向自由的途径，他们相信批判理论的方法与目的是融合的。但面对失败的教育，批判理论的处方功效委实值得怀疑。例如，夏普（Sharp）主张学校课程应揭露统治阶级关于自由社会的谎言，使大众认识到选择或变革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哈里斯（P. Harris）主张通过课程来揭露意识形态及促成师生间的理想沟通，从而使人们发现自身的真实处境并采取走向解放的行动；威里斯则忠告教师们理解“反抗文化”、给劳工阶级适当赋权等。显然，“要嘲讽这些建议的缺失是很容易的”^[13]，因为这些意在指导“如何做”的建议要么无可行性，要么苍白无力。

三、批判理论对高等教育的启示

（一）批判理论与高等教育实践

批判理论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情怀，它关注人的价值，将促进人的自主和解放作为理论建构的目的，即卡尔（Carr, W.）所说的“批判教育科学的教育性”。批判理论对科技宰制和工具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对权威的质疑与否定，都对高等教育实践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首先，必须认清“促进人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导向作用。教育不只是知识传授、技能训练，更是人格与文化素养的培育。大学如何在课程与教学中贯穿全人教育理念，如何将管理当成一门促使人的行为更加合理的艺术，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德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内容，但现实中德育要么让位于智育，要么被混同于政治教育，而集体主义的

说教其目标显然不在于锻炼道德推理能力。人文学科是实施人文教育的载体，但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的普遍倾向和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又致使人文教育备受冷落。如今，使学生在大学文化熏陶中养成健康人格已滑至大学目标体系的边缘，深受职业主义影响的大学与培训机构的界线趋向模糊，而就业应否作为大学的职能或目标，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大学的社会责任首先在于“育人”，而非“制器”。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大学要避免制造出机械呆板、缺乏创新的机器人，就必须教会学生质疑、反思和批判。按批判理论的观点，觉醒与批判是走向自由世界的通道，而大学教师正是引领者、解放者。教师自身如何从不合理的制度束缚中解脱出来，转化为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并着力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批判能力，这成为大学与教师共同思考的问题。

从大学管理的角度来说，管理是教育的手段还是目的？管理的效益是为了管理本身还是为了人？现实中，管理往往凌驾于教育之上，最突出的例子是大学官僚对学术的干涉和对资源的掠夺。在办学模式上，如今的大学过度关注市场需求，人才培养的目标、过程和评价都奉行市场标准，而片面的市场导向并不合乎大学作为一个育人机构或学术组织的本质。在市场思维与大学的逻辑之间应该存在一个相对平衡的基点。从此意义上说，象牙塔精神并非闭塞与落后的代名词，它有一种值得大学保有的永恒价值。此外，基于经济危机的大扩招、基于就业率的研究生学制改革、基于成本分担的学费增长、学术资本主义规则下学者变身“老板”以及科研与人事评价的量化标准，无不贯穿着经济判断标准和狭义的效率原则。而且在大学受经济因素鼓动的背后，还可发现政治的影子。中国大学向来视政治正确为无上原则，甚至媚权渐成其性格，缺了基本的大学风骨。“今天的大学是一些被阉割了的机构，没有了辩论，没有了不同的政治立场。”^[14]高等教育解放功能的弱化，正是大学片面追求政治与经济效益的恶果。而这一切，都体现了大学的工具性角色，工具理性的泛滥导致大学的教育价值湮没于经济及政治诉求。如今，盲目扩招、学费增长、量化滥化和职业主义的恶果已显。哈贝马斯指出，教育危机已成为当代教育文化的核心领域。

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者而言，批判理论的启示是，必须从根本上明确大学的本质，即大学作为一个育人机构，作为一个学术或文化组织，应始终将

人与知识作为核心，这是大学最主要的社会责任。大学可以是政府的智囊团，可以是企业的孵化器，但大学不能沉迷于世俗欲望，而必须在大学的逻辑归属与市场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二）批判理论与高等教育研究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批判理论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例如，从社会结构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学业差距，而非纠结于个体的智力与努力程度。就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下降问题，批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不公平的社会结构的再制工具，排斥了弱势阶层子女进入大学；农村或贫穷家庭子女在就业市场上的劣势同样是高等教育再制阶层差异的结果。再如，大学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是因为表达统治者意志的主流文化与具有内在反抗性的青少年次文化之间发生着控制与反控制。还如，批判理论通过分析种族或民族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来揭露教育不公平，等等。^[15]

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批判理论首先为教育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作为解放论哲学的认识路线，批判理论主张高等教育从物质决定论和主流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避免成为阶级复制的工具和陷入文化产业，而建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生活环境，促成人的自由。坚持批判理论认识路线，一方面启发我们审视传统的或流行的理论，如尽管实证主义作为当今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范式，但当以批判理论的标准去衡量之，确实发现了实证研究的诸多缺陷。批判理论提示我们反思，基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范式和科学研究方法可否或在什么条件下适用于高等教育研究？量化研究是否否定了教育世界的整体性及其所包含的人的主体性？预设的理论或假设是否阻碍了研究者积极实行动研究，积极涉入独特问题情境并在行动中形成扎根理论？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启发高等教育研究引入文化范式，关注人性与价值，使大学摆脱价值失却、行为失范、物欲膨胀、精神迷茫等一系列的转型期现象的困扰，重塑做人的尊严，制止学术泡沫和文凭的商品化，使大学重归神圣的殿堂。从研究范式的流变来看，具有强烈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的自然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教育研究的重要范式，教育批判理论也必然会越来越受到教育研究的青睐，许多学者正试图构建中国的“批判教育学”。当然，我们质疑实证主义并不等于抛弃它，正确的态度是对不同研究范式和方法的适当选择。发展中的批判理论也最终放弃了视自身为唯一方法的偏见。卡尔

主张教育批判理论是“教育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教育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具有相同意义上的科学性。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说，批判理论启发研究者以质疑、反思的态度去看已有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的精神，也是一种研究和创造的方法。

批判理论不仅具有强烈的解构精神，它还主张建构一个自由世界。这启示我们，首先，研究不止于方法运用，方法是服务于研究者理想的，没有目标指向的方法称不上是研究。如果批判理论仅仅停留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便与平常人发牢骚无异。而且，脱离目的的“方法”必将滑入工具理性的陷阱。需强调的是，批判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而是不因权威和流行而认同，也不必然站在其对立面的科学、理性的态度，学者的批判应该是理性地质疑、审慎地否定、客观地扬弃。批判理论致力于解放大众的价值指向则启示我们，研究者应坚持正确的研究立场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正确的研究立场是指学术研究者必须以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为最终目的，因此研究是服务于大众利益的，而非为了自身的私利而服务少数人的需要。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批判正是其促进社会进步和大众自由的工具。现实中，很多研究者已经沦落为权与利的奴婢，丧失了良知和学术立场。为民请命、为服务大众而研究就是研究者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希望通过学术为苍生服务的情怀，用北宋张载的话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参考文献：

- [1][15][美]乔伊斯·P·高尔等.教育研究方法实用指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
- [3][4][8][9][10][12][13]雷吉斯·吉普森.批判理论与教育[M].吴明根译.师大书苑股份有限公司,1989.
- [5][11][美]迈克尔·W·阿普尔.教育与权力[M].曲囡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7]贾馥茗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探讨与应用[M].师大书苑股份有限公司,2001.
- [14]索飒等.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J].读书,2002(5).